

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中国青年间隔期的 “时间需求”与反抗

■ 黄亦宽 郑作彧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近年来,践行“间隔期”的青年虽然受到了大众的持续关注,但也常常因背反“生命时间结构”而遭到非议和劝阻。本文旨在剖析青年在践行间隔期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探究青年克服此类阻力的方式。为此,笔者采用叙事访谈的方法,以24位中国青年在间隔期内的经历与感受作为主要材料,通过剖析间隔者在“个体”“群体”和“系统”三个层次上的境遇和努力,说明其在时间生态系统中必然会面对的“时间需求”矛盾及其应对矛盾的方式,揭示“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过程,以此深化时间结构的理论意涵。

【关键词】间隔期 时间需求 生命时间生态学 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07

一、问题的提出:争议重重的间隔期

“间隔年”(gap year / year out / bridge year)是一个直到21世纪才被介绍到国内的新奇概念,对西方国家而言,间隔年却并非新鲜事物。在西方,间隔年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兴起于17世纪中后期的“壮游”(The Grand Tour),即上流社会青年为开阔视野和学习语言而进行的环欧洲旅行^[1]。20世纪60年代后,间隔年概念得以推广,各国青年的间隔年实践在间隔时长、间隔目的、参与群体、活动内容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差异。从间隔时间来看,当代青年已不再局限于12个月左右的“间隔年”。琼斯(Andrew Jones)因此将如今的间隔年宽泛定义为:“在长期生涯轨迹中,个体所度过的一段从正式教育、培训或工作场所‘退出’的,为期3到24个月的时间”^[2]。因此,“间隔期”一词可能比“间隔年”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考虑到当代中国人在生命历程中的一系列时间节点,我们或许能把中国青年的“间隔期”界定为:人在

收稿日期:2024-05-19

作者简介:黄亦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时间社会学;

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社会理论、时间社会学。

青年时期度过的一段为期4到24个月^①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他们既未接受正规教育或培训,又未从事全职工作。

间隔期这一本不新鲜的事物,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下裂变出许多新鲜的样态,并引发关注和热议。伴随着旅游活动的狭义“间隔年”早在21世纪初便被旅行爱好者介绍进国内,围绕“间隔年”的争议也随之产生并延续至今。有人将“间隔年”视为了解世界、寻找自我的救赎之旅,认为其对于青年成长大有裨益,但也有人认为间隔年只是打着“成人礼”的幌子,让人在游山玩水或无所事事中逃避现实和责任。不过,狭义“间隔年”仅是间隔期的类别之一,各式各样的理由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催生出了形形色色的间隔期类型^[3]。与褒贬不一的狭义“间隔年”相比,这些间隔期得到的舆论评价通常更加负面。例如,为求职而度过间隔期可能会被扣上能力不足或缺乏规划的“帽子”^[4],为考研而度过间隔期则可能被斥为“浪费时间”或“逃避工作”^[5]。

这样的舆论状况不仅让青年的间隔期实践陷入重重争议,更体现出“生命时间结构”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下不可小觑的约制力。从出生开始,上学、就业、结婚、生育……人生的每一步似乎都在被周遭推着走,一旦有一处没有跟上社会期望的步调,后续的每一步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看法在青年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对于间隔期的悲观情绪也逐渐在互联网上弥散开来,甚至出现了“中国年轻人不配有gap”的声音^[6]。这样的感受反映出青年已经意识到“生命时间结构”的影响力。

“生命时间结构”指的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及其在时间的协调作用下产生的结构性秩序。这种秩序在生命时间中表现为,生命历程不仅仅是一个成长和老化的自然过程,更是一种通过阶段区分呈现特定结构的社会时间。在现代化进程中,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利用和更替要求使得人们生命历程被普遍划分为“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和“老年阶段”。人们在不同阶段的社会角色和权利义务亦有差别。可以说,生命时间结构为个体的生命历程提供了一份标注好阶段任务及其时间节点的“参考答案”,按生命时间结构生活的人因契合社会生活的节奏而具备稳定感和安心感,脱离时间结构的人则容易感到不安并面临阻力^[7-9]。

然而,生命时间结构的约制力也并非绝对。虽然面临阻碍,但始终未曾消隐的青年间隔期实践便是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绝佳反例。对这一反例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透视生命时间结构及其约制力如何体现在个体的生平实践中,更有助于了解在个体规划和运用时间的实践中,对生命时间结构的反抗何以可能。

因此,本文以曾经或正在践行间隔期的中国青年作为研究对象^②,旨在探究:与步步紧跟生命时间结构相比,度过间隔期这一看似“匪夷所思”的选择究竟会让青年遭遇哪些阻力?青年是如何克服这些阻力,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开展间隔期实践的?基于上述探究,尝试寻找生命时间结构的约制力和反抗生命时间结构的可能性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表现形式。

①之所以设定时间范围,是为了聚焦研究范围,将青年们在毕业后立即升学或就职前的短暂过渡期,以及长期脱离(甚至不打算回归)教育或工作的情况排除在外。由于青年们从学校毕业的时间一般不早于6月,毕业后立即入学或入职的时间一般不晚于10月,故将这一范围的下限定为4个月;又由于离校2年或以上从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一般会被当地政府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故将这一范围的上限定为24个月。

②为方便起见,下文将研究对象简称为“间隔者”。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既有的间隔期研究大体涵括三种类型:间隔期的概念界定^[10-11]、度过间隔期的动因^[12]、间隔期的意义与价值^[13]。虽然这些研究对间隔期本身进行了比较丰富的讨论,但大部分既有研究倾向于将间隔期视作某种孤立的生平事件或“中断点”^[14],对于间隔期与其他生命时间的联系缺乏关注。

若想触及此种联系,我们就不应以一种忽视时间面向的方式孤立地讨论间隔期,而是需要把间隔期放回间隔者的生命历程中进行观照。这样的分析或许可在时间生态学的框架中得以实现。

如果我们将能够通过某些互动来实现目的的个人、集体乃至社会次系统都看作行动者,那么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时间就并非仅是某种单纯的物理要素或自然秩序,更是一种能够协调诸行动者的行动参照机制。正是在时间的协调作用下,那些能够让行动者达成目的的互动才会在人们所欲的时刻发生^[15]。如果将时间视为让互动得以发生的工具,那么期望互动发生的行动者们自然会对这一工具有所需求。换言之,这些行动者总会有着通过安排和运用时间,来让其所期望的互动在所期望的时刻发生的需求,这便是“时间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互动暗含时间需求,因为互动的发生势必需要多方行动者的多个行动加以支持。因此,某一行动者表达时间需求的过程,也恰是对其他行动者的时间运用提出要求的过程。如果这些要求无法得到他人的配合,时间需求便无法被满足,互动便难以实现。更何况,目的的不同自然会带来时间需求的不同,为了争取各自时间需求的实现,不同的行动者是如何在社会环境中彼此协调的,便成了值得探究的问题^[16]。

为了对行动者间的时间需求协调模式进行经验考察并对该模式的公平性进行批判分析,郑作彧建立了时间生态学(Ecology of Social Time)理论框架。该框架将时间本身视为一种社会生态环境,探究具备不同时间需求的行动者们在这一整体性环境中的交互过程,并形成了一套可用于实证分析的社会时间生态模型^[17]。

郑作彧有关时间生态学的论述大多围绕日常时间展开,胡珊则比照郑作彧的社会时间生态模型,建立了一套可用于生命时间分析的时间生态模式。该模式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个层次是“生命时间生态个体”,个体能够从制度和周遭中寻求参照以进行生平规划,并且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生平实践。但人们的生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总会与他人的生平相互交织并彼此影响,生命时间彼此交织的一群人便构成了第二个层次“生命时间生态群体”。第三个层次“生命时间生态系统”,是若干个体和群体在同一个时间制度基础和同一套运作机制下共同构成的社会范畴。在同一系统内,人们的生平历程会受到类似的形塑作用,并呈现出相似的整体结构^[18-19]。

胡珊的生命时间生态模式理论框架尚未在实证研究中得以应用,难以找到合适的分析对象或许是一大原因。每一种时间需求在生命时间生态模式视角下都并非孤立,而是可能牵涉到散布在各个层次中的其他时间需求。把握不同需求间的关联便是了解生命时间生态系统

运作过程的关键。当各类时间需求“相安无事”时,这些关联往往显得零散,不同关联的重要程度也难以区分。而当不同需求间出现矛盾时,真正重要的关联反而容易“暴露”。如此看来,间隔期恰是一个应用上述框架的合适对象。间隔期对于时间结构的反抗性,使得“系统”层次的时间需求难免会在间隔者的生平实践中遭遇挑战,间隔者所面临的时间需求冲突也为我们了解其所处的生命时间生态系统提供了一个切口。

由于间隔期往往被视为从正式教育、培训或工作的常规轨道中脱离出来的一段时间,所以间隔者践行间隔期的核心时间需求也自然是“从由若干个正式生平阶段衔接而成的常规轨道中脱离,即“脱离常轨”。探究这一核心需求的实现状况,需要放眼间隔者所在的整个生命时间生态系统,考察间隔者们“脱离常轨”的时间需求在“个体”“群体”和“系统”三个层次分别激起了怎样的反应。

为此,本研究采用叙事访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可分为“实际访谈”与“资料分析”两个阶段。在实际访谈阶段,笔者先请受访者完整叙述从“开始考虑是否度过间隔期”到“结束间隔期”的生平经历^①,再对受访者叙述中的含混或简略之处加以追问,最后请受访者用概括性的话语对间隔期经历进行总结。在资料分析阶段,笔者先将访谈文本拆解为若干叙事段落,再通过时间顺序和段落间的内在关联将其串联为完整叙事,继而以受访者的自我总结为线索对其完整叙事中的重点部分进行分析,最后在比对不同受访者完整叙事的基础上,提炼出其间隔期状况的共性和差异^[20]。

叙事访谈法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更加强调整受访对象对于研究问题的適切性,而非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故笔者以“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尽可能贴切和丰富的信息”为原则,通过“滚雪球”的操作方式,寻找到了24位正在或曾经度过间隔期的国内间隔者(分别编号为A到X),并对其进行了叙事访谈。所有访谈均于2023年2-3月以及2024年1-3月在线上进行,对每一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均超过40分钟,所有访谈内容均由笔者在取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进行转录和匿名化处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见下表。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周岁)	间隔时的学历	间隔时的常住地	间隔总时长(月)
A	男	24	本科	武汉	至少32*
B	女	24	本科	上海	27*
C	男	24	本科	南京	15
D	男	24	本科	深圳	15
E	男	23	本科	成都	14
F	女	22	本科	南京	8
G	男	23	本科	广州	14

① 对于在访谈时仍处在间隔期内的受访者,则请其讲述从“开始考虑是否度过间隔期”到“访谈日期”的生平经历。对于有多段间隔期经历的受访者,则请其分别讲述每一段间隔期经历。

(续表)

编号	性别	年龄(周岁)	间隔时的学历	间隔时的常住地	间隔总时长(月)
H	女	26	本科	济南	14
I	女	27	硕士研究生	北京	14
J	女	24	本科	南京	14
K	女	24	本科	上海	13
L	女	24	本科	上海	14
M	女	27	本科、硕士研究生	武汉	30*
N	女	26	本科	西安	28*
O	女	27	本科、硕士研究生	南宁	至少27*
P	女	25	硕士研究生	济南	预计17
Q	女	27	本科、硕士研究生	南宁	32*
R	男	25	本科	西安	26*
S	男	27	本科	武汉	13
T	女	26	本科	乌鲁木齐	24*
U	女	25	本科	南京	至少14*
V	女	25	本科	上海	15
W	男	26	硕士研究生	长沙	至少9
X	男	26	本科	杭州	22*

注:在“间隔总时长(月)”一栏中带有*号的受访者具有多段间隔期经历,故其间隔总时长可能超过24个月。

三、“个体”层面的多样经历——“冲刺”还是“漫游”？

在从个体层面展开分析时,间隔期经历的多样性无疑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将间隔期经历划分为两大类:有目标间隔期和无目标间隔期。

(一)有目标间隔期:朝向终点的“冲刺”

对于相当一部分受访者来说,度过间隔期只不过是其未来规划中的一个步骤。C便是此类受访者的典型代表。C计划大学毕业后在国内攻读研究生,大四时考研失败,毕业后继续在校外租房备考。第二次考研被录取后,他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直到9月去往新学校后才结束间隔期。虽然可能与C略有不同,但所有在间隔前已有明确目标的受访者都有着极其相似的间隔期历程。

从图1可以看到,此类受访者原本计划在本科毕业后“无缝”进入下一阶段,但却因为既定目标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不得不度过间隔期。他们对间隔期的态度也存在相通之处,用H的话来说,那便是都或多或少将间隔期视为实现目标所需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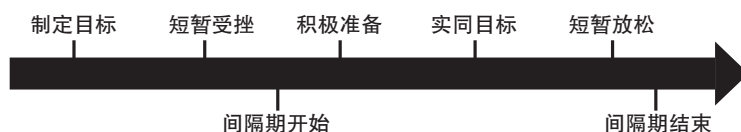


图1 有目标间隔者的相似经历

“成本”一词表明,度过间隔期的决策蕴含着间隔者在目标收益与时间成本间的权衡。人们可以提前规划未来,但未来却不一定尽如人愿。即便如此,个体还是能够把通过努力实现规划的过程视为一种“计划性事件”,从而改变对时间的体验和预期,将未知的通向未来的过程变为按规划达成某些目标的轨迹^[21]。

通过这样的转变,间隔者实现未来规划的内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在间隔期中,H不时会想到大部分同龄人都在本科毕业后立即进入下一阶段,而自己却需要通过间隔期来谋求进路,继而感觉:“我是比别人落后了一步的,我在心里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别人的优秀会倒逼你去做出一些改变”。虽然在确定度过间隔期时早已有所准备,但还是有许多受访者会像H这样将自身与同龄人的生命历程置于同一条人生轨道中进行比较,并感觉自己在这条轨道中落后于同龄人,因而将间隔期视为一种“迟滞”。为了纾解这种感受,间隔者往往急于实现自身规划,希望尽可能充分地利用时间资源来尽快达成未来规划。正因为如此,H才会认为自己的间隔期“就像是冲刺跑,那段时间里眼里只有目标”。

(二)无目标间隔期:限制重重的“漫游”

与H不同,也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在间隔期中并没有贯穿始终的目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在间隔期开始后寻找目标、摸索道路,也有一部分人会拒斥目标、希望在间隔期中得到休息。

J便是利用间隔期来确定目标的典型。临近本科毕业时,J虽已收到几家企业的录用通知书,但仍在“直接工作还是先读个研”之间纠结。这份纠结使得她并未在毕业后直接入职,而是选择在间隔期去相关岗位实习并思考未来规划。按照J的说法,确定未来目标和构建相应规划其实都包含收集信息等过程,间隔期则可以看作容纳这些过程的“空白”。对于此类“空白”的利用亦需精心安排,J在寻找实习岗位时就会格外注意将实习时长控制在半年内,申请的实习岗位也都在自身的意向范围内,从而保证自己的探索既“不会耽搁明年春天的申请或求职”,又“尽量对后面有比较直接的作用”。

另一部分间隔者不打算在间隔期追寻未来目标,而是选择利用间隔期来逃离既定轨道。Q在本科毕业后顺利入职,但在工作一年后却感到身心俱疲,决定辞职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开始间隔期后,Q的生活很快迎来了转变:“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老家……我是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没有工作压力,想做什么可以自己安排,保证自己的身体是好的就行”。除了自身压力过载之外,受到强烈的外部刺激也可能使人为了休息而开始间隔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M就由于剧烈的家庭变故而决定休学一年,等自己恢复后再投入学业中。值得一提的是,Q和M虽然都认为当时的自己确实需要间隔期以调整状态,但也都坦言会有意识地控制这种休息的时长,M就表示:“状态好一点之后,我就又开始想会不会影响到毕业之类的事,所以休学那年的末尾,我其实就已经没在休息,又开始看书了”。

通过将C/H的间隔期感受与M/Q相对照,可以发现对间隔期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与压力感知有关。如果压力在承受范围内,那么间隔者便比较容易视间隔期为“迟滞”并产生焦虑感。当压力超过承受阈值时,能够让人不再执着于目标的间隔期便成了一种“解脱”。不过,这种“解脱”也并非真正无拘无束的漫游,虽然间隔者们可能通过间隔期来为自己创造出探索或喘息的机会,但尽快步入下一阶段的压力还是会给间隔者们的“漫游”带来限制。

通过分析间隔者的纠结感受,我们已然能够了解“目标”在间隔期中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进入间隔期前便已确立的目标,还是在间隔期中依靠自身探索而建立起来的目标,都会让间隔者认为自身“脱离常轨”的时间需求具备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其争取满足这一需求的能动性也因此被调动起来。与之相对应,回避目标的想法和实践则容易激起间隔者对未来的担忧,继而陷入不安和自我怀疑之中,其“脱离常轨”的积极性也因此打了折扣。可以说,间隔者们践行间隔期的心态、在间隔期中的活动和度过间隔期的时长,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间隔期目标的影响。

四、“群体”层面的紧密联系——“同辈相和”与“世代叠加”

间隔者总会与其他社会角色的承担者产生互动,也因此总会处在某些“群体”之中。若想尽数间隔者与群体间的联系自然十分困难,但在整理资料时,笔者发现两种关系——同辈关系与家庭关系——会对间隔期产生显著影响。

(一)同辈相和:生命历程的横向联结

正如上节所述,受访者在间隔期中时常会将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历程进行比较,而年龄相近的同辈便是受访者们常用且在意的比较对象。G的父母时常会用他们在20岁前便已工作的经历来催促G尽快工作,G本人则对这种跨世代对比无甚感觉。但当G与同龄朋友交流时,他不仅会主动将自己与同辈进行比较,还会因比较结果而产生失落。

G的做法说明,同辈很可能比其他群体更容易被间隔者视作“参照群体”(reference group)。所谓“参照群体”,指的是人们会将自身与其进行比较,从而了解和判断自己的社会结构位置与生活状况的一群人^[22]。与不同的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很可能使人产生不同的感受,而选择比较对象本身又是一个掺杂着个人偏好的过程^[23]。相似的社会处境使得间隔者们更常将自身与同辈进行比较,也更容易受到此类比较的影响。

同辈并非仅能充当沉默的参照对象,一旦与间隔者具备较为密切的联系,同辈也很可能在间隔期内为间隔者提供各式各样的支持。

肯定和陪伴是最为常见的支持形式。C/H/I等人都是因为备战考研才选择度过间隔期,在备考期间也都有来往密切的“研友”(共同准备考研的朋友)。据他们所言,来自同辈的陪伴往往会比来自长辈的陪伴更容易让间隔者感到被理解和被肯定。除了独特的心理宽慰之外,同辈还为间隔者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或帮助。在国外高校取得硕士学位后,M希望参加国内大学的博士生招考,但对考试形式、考试范围等方面缺乏了解,还是通过求助高中和本科同学才“终于弄明白要怎么准备”。

在生平规划上的彼此参照和在生平实践中的相互帮助,使得同辈之人往往会影响彼此的生

命时间,其生命历程也因此联结起来。我们不妨将这种现象称为“同辈相和”。同辈间的来往越是密切,彼此越是亲近,这种现象便越发明显^①。与此同时,“同辈相和”也是有限度的,“不直接涉及物质或金钱”便是一条时常被受访者提及的互助底线。然而,度过间隔期需要经济支持,当间隔者考虑从何处获取这些支持时,家庭便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二)世代叠加:生命历程的纵向支持

在本研究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是在得到父母愿意提供经济支持的表态后才正式决定度过间隔期的。但在提供支持时,间隔者的父母也结合自身经历或判断而表达对间隔者的期望。如果间隔者本人的规划与家庭的期望彼此契合,间隔者按规划行事即可,但如果二者间存在分歧,间隔者便可能感受到来自家庭期望的压力。

G的间隔期规划就没有完全获得家人认可,在与家人同住时,他时常能感受到来自父亲的压力。正是为了减轻这种压力,他才会备考关键期选择搬出家庭与研友同住。因此,他将父母所提供的支持和因父母期望而感受到的压力称为“家庭的两面性”。

需要强调的是,将家人与间隔者的关系简单理解为“拿钱就要听话”的交易关系并不恰当。对于家人来说,无论如何表达,期望实现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间隔者本人的接受度。即使间隔者并不接受这些期望,家人可能也不会停止对其的支持。虽然G和父母在间隔期中曾因就业问题有过多次讨论乃至争执,但其父母始终没有断绝对他的经济支持。与之相对应,相当一部分间隔者会主动为家人考虑,并因此调整自己的间隔期规划与行动。A/H/J/N等人在访谈时都表示,之所以会在间隔期中寻找短期工作并不是因为父母的要求,而是自己希望设法减轻父母的压力。F的间隔期规划之所以会由考研转为求职,也是因为其在开始间隔期后感觉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紧张,希望尽快脱离间隔期。

从上述事例中不难看出,间隔者在间隔期内的生命历程会与家人尤其是父母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间隔者的间隔期经历是在“世代叠加”下由间隔者及其家人共同造就的。胡珊提出的“世代叠加”概念意指:当家庭中的某一世代难以仅靠自身完成人生事务时,这些事务便可能叠加到其他世代的人生任务中,继由多个世代共同完成,不同世代的生命历程也因此相互交织^[24]。那些没有完全实现经济独立的受访者,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才得以度过间隔期的。需要强调的是,或许是出于对将来的理性考虑,或许是由于身为家人的情感因素,间隔期导致亲代与子代间完全决裂的可能性往往较小。当父母期望与间隔者规划出现分歧时,双方更可能通过调整自身的想法或行动来让步,中国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韧性可见一斑^[25]。

总而言之,间隔期内的世代叠加既不能简单理解为子代向亲代的无度索取,也不应仅仅被视作亲代对子代的理性投资。在情感与理性的复合作用下,世代叠加成为间隔者从家庭中获得所需支持的有效模式。

从上述两种对间隔期影响最大的人际关系中可以看出:若想满足间隔者“脱离常轨”的时间需求,所在群体的支持往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间隔者之所以能从周遭获取支持,离不开

^①需要注意的是,间隔者能否从同辈处寻得支持并不完全由来往的密切程度决定,同辈关系本身的性质也非常重要。例如,在彼此敌视的状况下,无论同辈间的彼此参照和互动多么频繁,都无法为间隔者带来直接的正向影响。

与群体成员间的联系。换言之,“与群体成员间有着正向的长期联系”是使间隔者们能够“脱离常轨”的一个重要条件。

然而,认为群体无条件支持其成员的想法显然是不恰当的。若想获得群体对间隔期实践的支持,除了与群体成员的联系之外,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又是出于何种原因,群体支持才能够对间隔期产生如此明显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潜藏在“系统”中。

五、“系统”层面的制度环境——动力之源与阻力之源

(一)间隔期的制度基础:为什么想间隔?

制度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普遍期待,并通过政策法规、伦理观念、文化规范以及行为惯例等形式,约制着个体在不同人生阶段和领域中所承担的角色以及承担这些角色的时机、顺序和时长^[26]。

制度环境的影响,从间隔者及其周遭对间隔期目标的看法中便可见一斑。在本研究中,绝大多数受访者在间隔期内都考虑过追求升学。当进一步谈到为何会有此追求时,这些受访者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对于一部分受访者来说,追求升学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虽然促使其做出这一选择的动机涵括学术兴趣、留恋校园生活、向往就读名校等,但出现频率最高的还是对未来求职的担忧。对于另一些受访者来说,追求升学则更像是用来获取周遭支持的一个恰当理由。

从间隔者本人或周遭对升学的追求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套相通的逻辑: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如果能获得更高学历,自己在就业市场中便可能更具优势,因此应该追求升学。有趣的是,这套逻辑的核心,即“高学历带来好工作”,凸显了制度环境对于个体生命历程的显著影响。

科利(Martin Kohli)认为,人们的生命历程之所以能够呈现出如今的样态,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现代化。其所言的“现代化”,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进程。(1)生命的时间化。通过新生儿登记等一系列民政制度,社会将人们的生命变成了一段具备方向且以“年龄”为刻度的时间跨度,与年龄相关的制度规定或社会期望则将各式各样的身份和义务安排进人们的生命之内。(2)个体化。出身等先赋性因素对于人们的影响逐渐减弱,个体的努力在获得社会经济地位时的重要性逐渐上升,去背景化的个体又在社会制度的整合下担负起共同的义务。(3)经济形态的转变。生命历程的上述转变与从家事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相辅相成,生命历程的转变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充足且流动性强的人力资源,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促使人们的生命历程按照劳动力状况被制度分隔为“预备阶段”“使用阶段”和“枯竭阶段”^[27-28]。

依照科利所言,在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青年们普遍背负着尽快投身劳动力市场的社会期望。不过,青年们所追求的不仅是“快就业”,更是“好工作”。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往往以个体所具备的人力资本为凭据,学历则成了用于判断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工作机会与学历层次也因此挂钩^[29]。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相当一部分青年产生了通过提升学历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想法^[30]。

需要注意的是,间隔者们之所以能将升学作为提升就业竞争力的手段之一纳入规划,稳定的高等教育制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普遍具备三个方面的意义。(1)划

分时间。各学历层次往往都在学制中对修业年限有规定,并据此在人们的生命历程中划分出“高等教育阶段”。(2)赋予角色。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人们会被视为“高校学生”,高校和社会普遍期望学生们处于一种有别于薪资劳动阶段的单纯学习状态。(3)稳定预期。高等教育制度具备较强的稳定性,接受高等教育能够作为可预期的事件,被人们纳入生平规划^[31-33]。

在就业与升学制度交织而成的制度环境下,对就读条件、修业年限和毕业要求的规定使得间隔者们能够知晓升学所需的成本以及追求升学机会的风险,文凭对于就业的积极作用则成为了间隔者们可以预期的升学收益。在能够权衡成本(包括风险)与收益的情况下,攻读研究生被间隔者们视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二)间隔期的制度阻力:怎样才能间隔?

虽然青年具备一定的择业自主性,并会设法提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但市场与国家就业的调控作用也不可小觑。对间隔者来说,应届生偏好和年龄限制都是其在生平规划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应届生偏好既是一种制度规定,又是一种市场惯例。为了促使高校毕业生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在公务员考试和事业单位考试中都会放出相当比例的岗位专供应届毕业生报考,并会对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的企业给予社保、贷款、税费方面的优惠和直接补贴。年龄限制则更近似于一种市场惯例,指的是各类用人单位往往会在招聘或晋升职员时或显或隐地规定年龄上限,“35岁现象”便是此类年龄限制的集中体现^[34]。

应届生偏好和年龄限制等制度阻力,突出体现了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结构特征。中国人的各个生平阶段几乎都有明确的截止时间点,每到时间点,个体就被期望能够无缝进入下一个生平阶段。胡珊将此类无缝衔接、环环相扣的形态称作“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35],并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来自社会制度的生平约制力和大众对“环扣结构”的期望在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青年也自然会受其影响^[36]。

这样的“环扣结构”对间隔者来说恐怕难言友好。如果希望升学,年龄限制会成为一大问题。A曾经考虑过在深造后以学术为业,但目前已放弃了这一想法,其中的一大原因便是他了解到“学术圈内有一个年龄的限制”,而自己在深造后很可能因超龄而受到限制。如果希望求职,由于很可能被认定为非应届生^①,间隔者在参与企业招聘时往往仅能参加社会招聘,F就认为,参与社会招聘要面临的竞争远比参与应届生招聘更加激烈。

从上述受访者的间隔期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在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环扣结构”与“脱离常轨”的时间需求间存在直接冲突。间隔者抗衡制度阻力并让违背环扣结构的间隔期成为现实,往往需要倚仗个体与群体的合力。具体而言,离开了个体塑造自身生命历程的能动性,间隔者“逆环扣结构而行”的做法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个体的能动性也仅仅只是为间隔期实践提供了可能性,个体事实上能否度过间隔期,则与个体所处的群体环境有关。

正因如此,间隔者所在群体的倾向才会对间隔期实践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以同辈和家人

^① 应届生身份在不同求职渠道中有着不同的认定方法,例如,公务员考试会将毕业两年内的高校学生都算作应届毕业生,但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时都仅将毕业一年(甚至更短)内的学生视为应届毕业生。

为例,在间隔期中,同辈给予间隔者的独特支持弥足珍贵,得到同辈支持的间隔者更可能在度过间隔期时拥有稳定的心态,更少产生放弃间隔期的想法。家人是否有能力以及是否愿意提供支持更是会直接关系到间隔者们的间隔期抉择。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家人对践行间隔期的选择越是理解和支持,他们的间隔期实践就越顺利。

社会系统与间隔期之间的微妙关系表现为,间隔者们在践行间隔期时的动力和阻力都源于系统。一方面,间隔者个体及其所在群体对间隔合理性的权衡是在系统中稳定的制度基础上才得以成立的。另一方面,为了使人力资源能够持续满足社会需要,系统中又存在着对“环扣结构”的社会期望,并会通过规定、惯例等形式表达反对间隔期的倾向。要应对这种来自系统的反对倾向绝非易事,间隔者们需要发挥个体能动性和争取群体支持,才能够克服重重阻力,使“脱离常轨”的需求得以实现。

六、结论与讨论:“多力合成”下的生命时间

本研究发现,在时间生态学视角下,间隔期在间隔者个人规划中的意义会影响其践行间隔期的能动性,同辈、家人等群体成员的支持力度则会影响间隔期的可实现性,虽然社会系统对“环扣结构”的普遍期望会给间隔期带来阻力,但间隔者也可能从制度基础中寻找度过间隔期的合理性。简而言之,间隔者的自身能动性与群体支持的合力能否克服系统阻力,便是间隔者能否践行间隔期的关键所在。

由于经验材料方面的原因,本文所展示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局限或值得讨论之处。

在取材角度上,本研究所用材料大多是亲历者叙述,虽能较为细致地了解间隔者在间隔期内的感受、想法、规划与行动,但间隔者的同辈、家人等人际网络成员对其间隔期状况的实际影响则难以验证。

在材料范围上,本研究主要存在三点局限:其一,所有受访者均来自城市家庭,考虑到城乡家庭在经济条件、教育支出和教育期望上的差距,可以认为,与来自乡村的间隔者相比,受访者们度过间隔期的决策更有可能获得家庭支持^[37];其二,所有受访者都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具备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比起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的青年,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对研究生学历或主要劳动力市场岗位的竞争^[38];其三,本研究的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度过较长时间的间隔期并达成目的,属于相对“成功”的间隔者。

主要关注相对“成功”的间隔者固然是本研究的一大局限,但正是因为着眼于此,我们才能格外清楚地看到生命时间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力量对间隔期实践的影响。人们虽以个体为单位度过人生,但怎样运用生命时间却并非一人之事;虽然生活在若干群体和社会制度之内,但怎样生活也并非任由他人安排。个体能动性、同辈相和、世代叠加、环扣结构……一旦将能够形塑个体生命时间的种种力量(下文简称“形塑力量”)纳入考虑,对个体生命历程的解读便可以更加深入。

形塑力量往往散布在个体自身、所在群体和社会系统之中,虽然目的不一、强弱各异,但却共同造就个体的生命历程。我们不妨将这一过程称为“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如图2所示)。此类过程虽然未必如物理学中的多力合成一般精确,但已足以提示我们:每一段看似平静的生

命时间都可能是若干形塑力量激烈拉扯后的产物,如果未曾了解形塑力量的拉扯过程,便很难明白为什么某人会以某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度过其生命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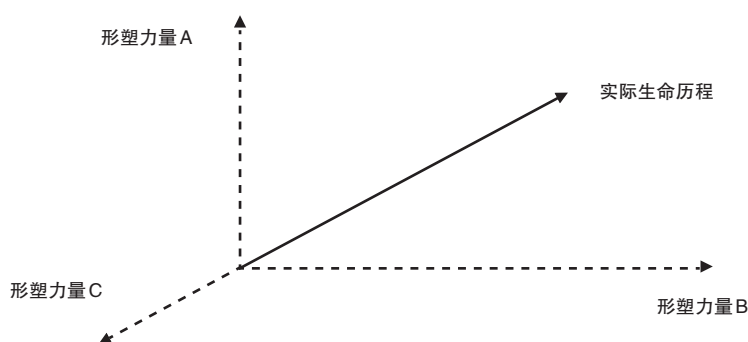


图2 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

如果把目光直接投向各方形塑力量,那么需要分析的对象未免过于庞杂,但从个体的生平实践中可以寻找到形塑力量的代表——时间需求。不同的形塑力量以及承载这些力量的行动者在寻求目的实现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时间需求,而不同的时间需求是相辅相成还是彼此矛盾,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对应的形塑力量是彼此叠加还是相互冲突。

以时间需求为线索,生命时间结构本质上是一组来自社会系统的时间需求,而步步紧跟时间结构的生平实践,就是系统导向及其支持力量在生命历程的多力合成中占据上风的表现。与之相对应,反抗生命时间结构的生平实践,便意味着反抗系统导向的各方力量在合力过程中更胜一筹。

生命时间结构不一定会与个体的时间需求截然对立,将生命时间结构的约制力简单理解为外在力量对个体时间运用的强行规制也并不合适。当社会系统的时间需求与个体的某些时间需求相契合时,个体的能动性也可能成为时间结构约制力的一部分,甚至促使人们参照生命时间结构对自己的生平实践进行自我监督和纠正。

相对应的是,反抗生命时间结构的生平实践也不应被简单视作个体时间自主性的纯粹表达。人们当然可以通过自我动员和自我调整去尝试实现与生命时间结构相龃龉的时间需求,但像度过间隔期这样的生平实践之所以能够实现,依靠的不仅仅是个体自身的调整,对抗生命时间结构的诉求与其他行动者的时间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契合,又能获得多少行动者的实际支持,也是决定反抗系统导向的各方形塑力量能否在“多力合成”中胜出的关键。如此一来,反抗生命时间结构的努力便带有某种悖论般的性质,从某些束缚中解放自身生命时间的努力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将自身时间推入另一些束缚中。

然而,即使个体的生命历程难以完全如己所愿,也不意味着人们就会受到生命时间结构的彻底宰制。践行间隔期的青年们便是一例明证。他们突破各方阻力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如果希望矫正生命时间结构的过度控制,让人们的生命历程更具开放性,依靠个体的觉悟和调整终究作用有限,整个时间生态系统都应当参与到改变中来。那么,究竟要怎样处理时间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形塑力量及其时间需求间的关系,才能为生命时间的“多力合成”创造更多可能性?这或许将成为又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10] 陈艳萍:《“间隔年”:国外青年教育的新路径》,载《青年探索》,2014年第4期。
- [2][11] Jones, A.. Review of Gap Time Provis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4, p. 22, p. 22.
- [3] 李春瑶:《脱嵌与迷惘:“间隔年”青年的另类内卷实践》,载《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11期。
- [4] 郑晓明 王 丹:《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与治理策略》,载《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
- [5] 毕红艳:《我国高等教育的过度与“考研热”现象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6] 《中国年轻人,不敢有 gap time》,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63600
- [7] 郑作彘:《生命时间的结构性》,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 [8] 郑作彘 胡 珊:《生命历程的制度化:欧陆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载《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 [9] Bergmann, W.. The Problem of Time in Sociology: An Over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Stat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on the “Sociology of Time”, 1900 – 82, Time & Society, 1992, (1).
- [12] Coetzee, M., Bester, S.. The Possible Value of a Gap Time: A Case Study,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9, (3).
- [13] King, A.. Minding the Gap? Young People’s Accounts of Taking a Gap Time as a Form of Identity Work in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11, (3).
- [14] Wu, M., Pearce, P., Huang, K., Fan, T.. “Gap Time in China”: Views from the Participan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5, (2).
- [15] Shove, E.. Time,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Practice, Materiality and Culture, Oxford: Berg, 2009, pp. 18 – 19.
- [16][20][28][33] 郑作彘:《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 – 209、106 – 110、71 – 73、210 – 215页。
- [17] Cheng, T.. The Ecology of Social Time: An Outline of an Empiric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the Sociology of Time, Time & Society, 2017, (2).
- [18][26][32][34][36] 胡 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生命历程结构的社会构成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
- [19][24][35] 胡 珊 郑作彘:《中国人生命历程的环扣结构与世代叠加》,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 [21] Brown, E., Patrick Mary.. Time, Anticipa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Egg Freezing as Temporarily Disentangling Romance and Reprodu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 (5).
- [22] Hyman H. H.. The Psychology of Status, Archives of Psych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1942.
- [23] Buunk, B. P., Collins, R. L., Taylor, S. E., VanYperen N. W., Dakof G. A.. The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omparison: Either Direction Has Its Ups and Dow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6).
- [25] 胡 珊 郑作彘:《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
- [27] Kohli, M..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
- [29]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刘慧珍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40 – 255页。
- [30] 李春玲:《风险与竞争加剧环境下大学生就业选择变化研究》,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 [31] 刘 浩:《生命历程的结构化:乡村青年城镇化的二元路径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
- [37] 刘保中:《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状况的比较研究——基于CFPS(2014)数据的实证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2期。
- [38] 吴愈晓:《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特约编辑:张 宪)